

20世纪30年代山东中学国文课堂内外的新文学

刘子凌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经历了从纯文言文教学到以白话文教学为主导的重大转变。作为白话文的重要载体，新文学在山东的中学国文课堂内外得到了广泛传播。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引发了教与学两方面的深刻变革，国文课堂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同时彰显，从而拉近了教育和现实生活的距离，提升了师生们关注社会现实的自觉。在此基础上，国文课堂不仅加入了新文学再生产的链条，而且为广泛的革命动员提供了历史情境。20世纪30年代山东中学的国文教学，构成了立体认识新文学之历史意义的生动个案。

关键词 新文学；中学国文；革命动员；山东

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令行各省——“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1]。这一事件影响深远：“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中抬高白话文地位的意见，因这一纸训令而沉淀为教育政策层面的部分现实，新文学的体制化，也有了可能。

新文学进入民国教育体制意味着什么？学界已在这一问题上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唯相关研究多取教育史视角，似尚有所不见。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山东地区的相关文献为中心，描述新文学在中学国文课堂内外的存在状态，尤其关注溢出国文课堂的某些维度，并在此基础上重估其历史意义。

一 白话选文引发的教学变革

学界公认，1920年的教育部训令并未使白话文的胜利一蹴而就。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以及在更高位次的教育阶段，文言仍未退场。事实上，根据“国语课程纲要”，这一时期初级中学的国文教学就须“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由语体文渐进于文体文，并为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基础”^[2]；到高级中学阶段，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一方面强调“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另一方面，还要“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3]，高级中学第一组（大致相当于今日之高中文科班）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甚至安

排了“文字学引论”和“中国文学史引论”等堪称“高深”的内容^[4]。

考虑到文言在时人文化素养的形成和日常交际、文牍处理等方面的作用，制度设计者采取这样一条“渐进”的路线，当是稳妥之举。不过，两种文体的并行也就等于把文言和白话的对峙状态制度化了。这一“传统”在南京国民政府历次颁布的国文课程标准中同样清晰可见，它们也都是随着教育阶段的延伸，由白话逐步过渡到文言，渐趋深奥。两种文体双峰并峙构成了中学国文课堂上一道绕不开的风景，无论何种性质、何种形式的国文教学，都必须直面这一问题。观察中学国文课堂中新文学的位置，这是一层重要背景。

白话文何时被山东的中学国文教师选为授课内容？这一问题，史料所限，难以做出确切的回答；而且不同地域之间也应该存在相当差异，无法一概而论。不过，如果先不把学生的自主课外阅读计入正式的“教学”活动，授课教材无疑是观察中学国文实况的最直观指标。

民国中学国文领域最早出现的白话文教材是《国语文类选》和《白话文范》。后者再版多次，影响较大^[5]。但这种完全以白话文字为对象的教学方式，未必是通例。20世纪20年代“除少数激进者外，多数人认为初中国文课上仍须教学文言文”^[6]。此后的多数教材回应的正是这种主流意见，或文白兼采，或全为文言，纯白话的选本较为少见。文白并

行的状态，在整个民国时期，亦大率如此。

1930—1931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情况调查。参与调查的有省立师范学校五所、乡村师范四所、中学十四所（包括初中、高中和女中）、职业学校三所，县立中学十九所，私立中学五所。这个体量虽然没有包括辖区内所有中学，但样本数已具备相当的代表性了。

调查问卷原文今不可见，但从各校回复可知，调查内容第一项就是“教材”。此时段在山东中学间最为通行的教材有两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国语与国文》，有些学校另搭配以开明书店正在出版的《开明活叶文选》。几种读本，都是文白混编的体例。

中学教师们这种选择教材的思路，直接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29年8月颁行的《中小学课程暂定标准》的支持。该标准规定，初级中学三年内，教材中语体文和文言文的比例“递次为七与三，六与四，五与五”^[7]。这应该是当时较为通行的分量。《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的编者明确提到，他的选文“第一学年语七文三，第二学年语六文四，第三学年语文各半”^[8]。

这一比例并未被山东各校严格遵循。大致说来，初中一年级的语体文比例处于十分之八（如省立第一、第四、第七中学）到十分之六（如省立第十二中学）之间，二年级比例在十分之七（省立第四、第七中学）到十分之四（省立第三中学）之间，三年级比例在十分之六（省立第四中学）到四分之一（省立第八中学）之间。出入或许不算十分悬殊，但文白比例既然被确定为“教材”项下的一个调查目标，说明这些数字还是颇受看重的。教材既非指定，选文的构成和篇目，首先反映的就是教师的知识趣味和倾向，各地一线教师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9]

再来看白话选文的具体内容。如仔细研读朱文叔编辑的中华书局版《新中华国语与国文》，应该说，新文学在其中并未占据特别突出的比重，整套书有相当一部分篇幅其实是在探讨中学生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而非带给学生写作方法上的启示，或审美上的陶冶。以“问题”为导向的编辑思路，朱文叔已有过尝试。其所经手编选的最早白话文教

科书《国语文类选》，就是将选文依照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等名目，分为十类。《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的架构，与此隐隐相呼应。

对时代思潮和种种“问题”的关注，带来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挑战——这是中学国文教学目标的题中之义吗？按照省立第三中学国文教师沈孜研的看法，答案是肯定的：“初中学生思想之变迁，完全寄托于国文一科上”，中学国文教师甚至“负有领导青年思想之使命”^[10]。八中也有教师发现了时代的“错误”——“国文教员差不多已成了中学生思想的唯一领导者了”^[11]。七中教师倒是没有唱出“领导思想”的高调，但强调授课时要“扩充教材的范围”。作为范例，围绕巴比塞的《名誉十字架》，这位教师设计了如下一些话题：战争的起源与演进、人类战争日趋于残酷的原因、战争对象合理之转变、战争与非战文学、和平运动的意义。先一一加以旁涉，然后再导入本文，总结主题，并由学生自由讨论^[12]。

这样的国文课，几乎已与“时政讨论会”无异。而这里应强调的一点是，作为时政研讨对象的材料，往往不是文言文，而是白话文——包括白话论文、新文学作品和翻译文字；相应地，源于主题上的接近，文言文也跟白话文产生了联系，经常排列在一起，隐隐构成一个教学“单元”^[13]。

这与传统的文言教学大异其趣。据亲历其事的叶圣陶回忆，当年面对文言课文，教师“只要把书本上的文言句子一句一句讲下来，这个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方言里分别怎么表述，“这就行了”；“两个字的一个词，可以讲它十分钟，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可以讲它三课时，很容易应付”。白话课文的加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文字都是学生读得懂的，毋庸再来一道翻译的手续，教师也就“对白话文实在害怕”，因为它“没教头”——“白话文有什么讲头？”最省事的办法是干脆不讲，“叫学生自己看看就算了”^[14]。

明乎此，可以肯定地说，以“问题”为中心的教授或讨论，正是白话文教学困境中的一套解决方案^[15]。各类教材的选文篇目中虽然也有一些古代或近代白话小说的节选，更多的白话文材料还是产

生于文学革命之后，与学生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十分切近，这时，无论国文教师是否以“领导思想”自命，“思想”方面的内容都会随着白话文素材一起呈现在中学生面前。换言之，白话文之进入中学国文课堂，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一条引导学生去关注社会问题的通道。

二 重视“文艺”与尝试创作

除强调白话选文的思想性外，也有不少调查中的山东中学更加侧重国文与“文艺”的亲缘关系。比如，“文艺”作为关键词，在省立一中的国文教学中俯拾皆是。教师设定的“教学之目的”，开宗明义第一条便是“引起文学之兴趣，涵养革命之热情”，教材“选材首重日常生活之文艺创作”，教学时的精读工作也要求注意“欣赏文艺之美点”^[16]。省立二中初中一年级和三年级设定的“教授目标”，在强调“输入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的同时，分别还希望“引起学生对于文艺欣赏的兴趣”，“引起学生对于文艺有研究的志趣”^[17]。省立五中则把“文艺”由浅入深地均匀分配在初中三年里：第一学年，侧重“浅显的写实的抒情文和叙述文”，多选近人如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鲁迅、叶绍钧、冰心、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的小品文字；第二学年，“多选较饶理想的文艺作品”、近人的“文艺杂论”，辅以莫泊桑、都德、柴霍甫（按即契诃夫）、王尔德、菊池宽、有岛武郎的若干篇章；第三学年，“广集叙述现代思潮的议论文，适合环境的应用文，介绍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的研究文，以及世界文学家的各派作品”^[18]。五中的教师取得了最大公约数。

在调查中能够看到，胡适、周作人、鲁迅、叶绍钧、冰心、朱自清、俞平伯正是各中学选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新文学作家，其中周氏兄弟、胡适、冰心、朱自清等几位还实现了对十二所省立中学的“全覆盖”，篇目也不局限于《新中华国语与国文》提供的那些。新文学的“经典化”，在这种教学实践中悄然发生。

重视“文艺”的另一种表现，是创作。省立一中教师在列举教材选文来源时，特意加上了“范

作”一条，即“教师之作品”——“盖学生未有不对教师作品感受兴味者，乘机教读一二，效力定当十倍于死沉沉之教科书也”^[19]。言语之间，似乎一中教师对自己的创作颇有自信。事实上，教师中文艺名家辈出，或许可以看作这所学校的校风之一。李广田的教学活动，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20]。限于篇幅，这里更想分析的学校，是山东省立第六中学/菏泽中学。

六中在山东省立中学序列中居于十分显赫的地位。当年对这个学校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其毕业生何思源。何氏执掌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前后十数年，其求学道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也成为六中学生的人生目标。学风朴实向上，师生素质出众，经费充足，于是六中创办了一份高质量的新文学刊物，《六中/菏泽中学学生汇刊》^[21]。

这份刊物的稿件相当纯粹，除几首旧体诗作外，清一色的新文学。而且它篇幅较大，第3期有130余页，第4期和第6期更是达到180页以上。这样的容量，保证了内容的多样——一期刊物里，经常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论、书评、翻译等等体裁，无一不备。以一个中学的师生阵容能撑起6期，且每期100余页，甚至近200页的篇幅，已属不易，可据编辑说，“每期牺牲的稿件，差不多要占全数二分之一”^[22]。六中校内新文学创作的繁盛，实在是大有可观。

当然篇幅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内容和质量更值得注意。从诞生之日起，刊物的“指导员”就赋予了它某种使命感：“风雨飘摇，/河山萧条；/你抱着伟大的使命，/在这时，降生了。/你是悲天悯人的心声，/你是振聋启聩的晨钟，/你是沙漠里的甘泉，/莫辜负这个愿望呵！”^[23]师长的期待与具体从事编辑工作的学生心意相通，后者反复强调“这个刊物，虽然是为了自己的精神的健全，但也希望不至忽略了我们生存所在的此时此地”^[24]。总体上看，《六中/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的作品，带有比较浓厚的学生文艺性质，多取材于身边琐事，内涵相对单薄。但也因为如此，学生生活的困苦、农村经济的凋敝、国人民族情绪的激昂，都有所反映。这是一份带有相当强烈现实关怀的刊物。事实毋宁是，师生们的创作冲动，本就在相当程度上出于现

实关怀的激发。在此意义上,这种鼓励新文学创作尝试的国文教学思路,与“问题”导向、重视“思想”的教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正是源自这种文学立场,《六中/菏泽中学学生汇刊》上出现了对武者小路实笃艺术观的不同意见——承认这位日本作家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又明确提出:“凡有艺术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作者虽不能不推重个性在艺术上的价值,但亦当从客观方面剖开了社会底核仁,来评定社会底一切暴露着的现象”,所以应“一面借鉴武氏这种卓绝的精神,一面睁开眼来对于社会人生仔细地探讨吧”^[25]。也出现了对其时流行的“小品文”的讽刺和批判:“我们现在虽是为各方面所欺骗着,但希望着我们的所谓艺术家们,总不至于再来欺骗大众吧!”^[26]在年度总结的文字里,举凡1934年文坛上的文言白话之争、“大众语”的讨论、“幽默”“小品”文学的热潮,以及创作界的消沉,都被纳入了“鸟瞰”的范围^[27]。对文坛热点问题的追踪,说明六中师生对新文学动向基本达到了同步反应的程度。

还有一点值得专门提出来,那就是《六中/菏泽中学学生汇刊》对鲁迅的特别关注。比如说,由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的《伪自由书》,已经进入六中师生的阅读视野,有人在1934年3月12日就写出了读后感。上距此书的出版时间(1933年10月)为五个月,传播的速度,并不太慢。而在这位读者看来,此书的内容与笔法“实超过热风,华盖集以上”^[28]。结论容有异议,但足见其对鲁迅作品的熟悉。1934年出版的《南腔北调集》,也在年度总结中赢得了好评,被认为“给与我们的文坛以不少的光辉,同时也是赠给青年们的一种精神上的食品”;相形之下,“旅居日本”“专心研究发掘出来的龟甲兽骨”的郭沫若,以及“使我们信任”但却“只作些清丽小品文”的郁达夫、周作人,则不免令人感到“莫大的遗憾”^[29]。六中出版物的成功,显然是以浓厚的新文学阅读氛围为前提的^[30]。

三 新文学的广泛流行

由于出版资源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能够出版连

续出版物的中学只是少数。更多师生对新文学的接触恐怕要止步于阅读,而无法将创作或评价上的尝试变成铅字。比如五中,它十分强调国文教学中的“文艺”内容,其学生刊物,也有《蓓蕾》《快刊》《浪花》《自由周报》《沂风》《博爱周报》《新生活周刊》等七种之多^[31],但都已很难找到实物。也许是油印刊物或壁报,无法传世。

但这些学校里新文学的读者未必少。如八中教师所言,“学生课外阅读十之八九是文艺,尤其是内容关于恋爱方面的文艺”^[32]。具体来说,这类读物多为“创造派诸人著作”,而“新兴文学,亦有少数人阅读,但因购书不便,未成时下‘普罗狂’之风气”^[33]。

要确切描述新文学在学生中流行到何等程度,史料所限,十分困难。不过,省立中学外,县立、私立中学观察到类似状况的教师,颇不鲜见。他们经常抱怨,尽管他们在文言教学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学生却不是很感兴趣,学生中更为流行的,是新文学出版物。比如,高密县立初中的学生,虽对文言的把握渐有进境,“但仍不如欢迎语体之热情”,“学生最爱阅者为语体小说而新小说之谈爱者十居八九凡阅时一见教员辄纳诸袖中或藏之他处”^[34]。黄县县立初中的学生,同样“大都爱好流行小说而不喜探讨旧著”^[35]。平原县立初中二年级学生共三十人,“十七八人喜欢语体文,对于白话小说,及各种杂志,订购者不少”;还有几个学生“对于国语,非常爱尚,愿作有系统的研究”^[36]。东平县立初中成立不久,学生的倾向已很明显——“对于语体文颇感兴趣,不甚喜文言文”^[37]。济南私立正谊中学里,“近代文艺之作品,学生自备甚多”^[38]。从长山县立中学学生自己的视角看去,虽然学校订阅了多种报纸以方便师生了解时事,可“有许多同学,当他看报纸的时候,他只注意到上面的文艺栏。(如申报自由谈,及大公报小公园等。)其他的主要的消息,略为一翻便算过去了,这简直等于不曾看”^[39]。

需要补充的是,在这时国文教学的整体设计中,课外阅读本来也非厉禁,相反,却是被相当看重的部分。山东省教育厅的调查,为此专门留出了篇幅,就问卷情况来看,国文教师也不敢轻忽,常

常力图予以有力的指导。

课外读物的第一个来源是学校的图书馆。当年中学图书馆的书目记录和档案难以觅得，这方面的状况已经不易确知。成立不久，或不幸遭遇兵燹的学校，时常苦于馆藏不足，或校产荡然，无法给学生提供基本的阅读条件。问题在于经济实力好一些的学校。它们的图书资料储备，应该会多一点。至于具体的藏书规模，有两个例子或可供参考。

一个是青岛市市立中学校。在该校校刊上的一份馆藏图书的《作家姓名笔名对照表》中，40位新文学作家赫然在列，体现出这样一所学校图书馆中新文学书籍的入藏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可观的^[40]。同期刊物上的《图书馆现有图书及图书价值统计表》，文学类1155册，仅次于社会科学的1476册。在《青岛市立中学校图书馆逐日借书分类统计表》（1924年9月）里，还可查到文学类读者本月总计88人，小说类总计250人的记录——均遥遥领先其他类别的书籍。

在没有更直接的证据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文学和小说就一定是新文学和新小说，国文习作就一定是白话文。但回顾校史，陆陆续续任教于青岛市中的新文学作家、翻译家有王统照、汪静之、陈翔鹤、张友松、章铁民等人，毕业生里则走出了于黑丁、黄宗江、李白凤等人。这无疑构成了校刊上那份馆藏材料以及青岛市中新文学阅读与教学成绩的最好注脚。新文学的再生产，就有一部分位于这样的链条之中。

另一个例子是长山县立中学。该校对1933年8月至1936年7月间到馆新书进行的统计显示，文学类图书有309册，比居第二位的社会科学类图书169册，多了近一半。除大量的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外，新文学方面，周作人、冰心、巴金、茅盾、鲁迅、郭沫若、丁玲、朱自清、林语堂、胡适、叶绍钧、刘大白、老舍等作家都记录在案。在“旧管书籍”清单里，这些作者再次出现了^[41]。一所县立中学拥有如此堪称丰富的馆藏，这多少像是个异数。当然，新文学的经典化，也反映在这样的一份县立中学图书馆藏目录之中。

课外读物的第二个来源是学生自备。上文中提及的国文教师的抱怨之声，也多与此有关。这方面

较为详尽的材料，来自省立五中。据统计，该校学生自备读物中，数量居前的新文学作品是《蚀》（33册）、《稻草人》（29册）、《海滨故人》（29册）、《超人》（28册）、《寄小读者》（25册）、《虹》（24册）、《落叶》（17册）、《呐喊》（15册）、《彷徨》（11册）等。郭沫若的著作，如《女神》《橄榄》《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小说戏曲集》（以及译作《石炭王》），郁达夫的作品集，如《达夫全集》《沉沦》，也获得不少读者青睐^[42]。

课外阅读，经常是课内篇目的自然延伸。冰心、叶绍钧、徐志摩、鲁迅的集子，便应是由教材选文而进入学生的视野的。值得注意的是，创造社成员的作品，确实较为普遍地受到学生的欢迎。事实上，在调查问卷中简要描述了学生自备读物情况的学校，像招远、广饶县立初级中学，济南市私立育英中学等，大都记录了郭沫若、郁达夫或者《女神》《橄榄》《水平线下》《文艺论集》^[43]《沉沦》《达夫全集》《日记九种》的信息——这便印证了八中老师的观察。另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普罗文学的一纸风行。茅盾的《蚀》和《虹》的销量之多，有些出人意料；此外，蒋光慈的名字及其《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冲出云围的月亮》《丽莎的哀怨》等作品也经常出现。如果考虑课外阅读的“延伸性”，由于后期创造社的“向左转”，只要读者对郭沫若等人的创作和翻译稍作追踪，他们的影响力就不会止于鼓吹恋爱自由的层面^[44]。“革命”+“恋爱”，本就一度是文坛的时髦。因为缺乏直接的实证材料，学生的接受心理不便妄猜，但他们大致的关注焦点，还是可以由以上书单得其仿佛。

四 “读书会”中的革命动员

书单不是静止的。33册《蚀》的读者，很可能不会局限于其33位拥有者。相互传阅，交换读物的情形，在各中学相当普遍。且不说拥有一个好图书馆在很多学校已是奢望，种种迹象表明，以余力购置课外读物亦非普通学生家庭可办。30年代农业破产、农村凋敝的情形屡被述及，而不少老师也辛酸地感慨，学生出身农家，求学不易，要他们能交齐学费，做到不辍学已勉为其难，哪有能

力再改善学习条件?于是,作为一项因应之策,大大小小的“读书会”,或起于老师引导,或出自学生自发,几乎遍布于各所中学——省立三中、八中、九中,莒县、招远、广饶、淄川、临淄县中等校的调查问卷都留下了相关记录。同时,在省立一中、十二中,文登、莱阳、寿光、平原、栖霞、淄川、临淄县中等校还存在着不少“文艺研究会”。据长山县立中学校刊“校闻”,发起文艺研究会的启事揭出后,“各同学踊跃参加,瞬间即达五十余人”^[45]。这显然是该校丰富的新文学馆藏的衍生现象。“研究”当然是以阅读为前提,“读书会”“研究会”,功能和使命互有交叉。

仅着眼于新文学传播,还不足以穷尽“读书会”“研究会”等组织的历史意义,如果视界放宽些,还有一点是很清晰的——它们还作用于广泛的革命动员。

党史研究已经证明,“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而在此过程中,“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46]。问题在于,这群“普罗米修斯”是具体通过何种渠道“播火”的?《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里记录的大量的“读书会”和“文学研究会”等组织,可以部分地提供答案。

姑且举两例。1930年,共产党员王溥泉就任省立七中训育主任,“组织学生先后建立起‘课外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学术研究团体,并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47]。

1934年,王翔千在莒县县中做国文老师。据当年学生回忆,他“不按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国文课本施教,而是自选课文,自编讲义。他选讲过陈独秀的《人生真义》、鲁迅的《野草》、高尔基的《海燕》以及古文《愚公移山》、《齐大凯》、《黔之驴》等篇章”。在课外,“他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指导大家学习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阅读鲁迅、高尔基以及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培养我们攻读课外读物的兴趣和追求真理的高尚情操”^[48]。利用职务便利,在课内课外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做法,构成了这一时期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某种重要“模式”。

知识分子群体在早期党史中的作用,早已为人熟知。中国共产党本是一个有系统的理论主张的现代政党,它所持有的革命思想,并不容易为自己的动员对象——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迅速、精准地把握。在革命理论与其试图唤醒的广大群众之间,是知识分子在发挥力量。^[49]这批知识分子,以新式教育下的师生居多。

20世纪30年代读书会和文学研究会的活跃,就是这一动员模式的表现和延续。《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6卷^[50]集中收录了1927年8月到抗战爆发前的大量回忆录,略加翻阅即可发现,流风所及,30年代山东各地的师范,如第一师范,乡村师范,如济南、临沂、滋阳、文登、寿张乡师,还有一些小学,在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有读书会活动。至于没有有形组织的、个人之间的书刊传阅、革命知识宣讲,更是俯拾皆是。

读书会读什么?调查问卷里列举的学生自备读物,既然风行于学生中间,应会得到重点关注。两方面恰好相互印证——读书会接受革命宣传的一个渠道,果然也就有为数不少的“左翼”文学作品书目保留在调查问卷之中;反过来也可以说,“左翼”文学作品的流播,使得读书会成为研习革命知识的场所。

事实上,在这方面中学并非一块“飞地”。有研究者利用30年代山东、河北地区师范生的传记资料统计了“对他们政治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书籍杂志清单,除了马、恩、列、斯以及一些革命理论著作外,包括鲁迅、郭沫若、曹禺、巴金、茅盾、萧军、萧红在内的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邹韬奋主编的《生活》、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和丁玲主编的《北斗》等刊物,都位列其中^[51]。可以想象,同气相求的读书活动,强化了参与者的共同体意识,而革命文学中的革命者形象和革命行动,又将革命理论化为具体可感的行动指南,为它的读者提供了可供追蹊的实践样板。

结 语

从教育史的视野看,白话文的选用,内在地要求师生转变教与学的方式。传统教学,尤其在发蒙

阶段，经常流于记诵之学，而“现代教育注重的是学生主体性的发挥，目的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此情形之下，白话文因为“以口头语言为基础、能够充分表达个人思想感情”^[52]，遂历史性地承担了实现国文教育现代转型的任务。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文课堂与实际生活的距离，骤然拉近了。国文课时常变成时政讨论课，即其表现之一端。这样也就开启了各种社会思潮进入国文课堂和学生生活世界的一条通道，激发了师生的现实关怀。

后来者应该警惕出于历史的“后见之明”，而对过去采取“倒放电影”的态度，陷入目的论的风险^[53]。历史的丰富性，史实具在。必须承认，新文化的传播“替胡适之造了许多信徒”，埋头学业，醉心“国故”，不闻外事的学生不在少数；但另一方面，它还“替陈独秀造了无数党员”^[54]：在国文课堂上读到新文学作品，因耽读新文学而走上创作道路，又走出课堂，经由读书会的启蒙而加入革命动员的行列，进而从事革命实践，这也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逻辑线索。

总之，30年代山东中学的国文教学，提供了一个丰富、生动的新文学传播与再生产的“历史现场”。本文无意夸大这一个案的代表性——缘于政治格局、文化传统、人事关系、教育资源分布等因素的不同，此时中学国文教学存在广泛的地方性差异，只是想藉此话题打开理解新文学之历史意义的另一维度：它不仅体现为对某种现代价值体系与美学形态的书面“表述”，同时还可能将其传播者和接受者铸造为历史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实践的中介^[55]。换言之，在多元决定的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我们不应忽视新文学所占的相应份额。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现代文学的实存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4DWXJ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之部令》，《申报》1920年1月18日。

[2]《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参见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第243页，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这个纲要的起草者是叶绍钧，附表的起草者是胡适。

[3]《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参见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第253页。这个纲要的起草者是胡适。

[4]《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参见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第256—259页。这个纲要的起草者是胡适。又，相关课程，或称“国语”，或称“国文”，其侧重和目标存在微妙的差异和紧张，限于篇幅，此处不做展开。本文除引用时悉依原文外，一般均以国文称之。

[5]比如，第一册1926年12月已出至11版，第二册1927年1月出至9版。

[6]李斌：《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第89—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第2册 初级中学之部》，第3页，卿云图书公司1929年版。实际上，这个比例在国民政府迭次修订的课程标准中均保持不变，可谓共识。

[8]《编辑大意》，《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第1册，朱文叔编，第2页，中华书局1928年版。

[9]《新中华国语与国文》告知使用者，选文分量“特行加多”，“材料丰富，便于教者选择活用”。（《编辑大意》，《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第1册，朱文叔编，第2页）《开明活叶文选》更是如此，“编印先后，不立一定程序，任教师或学者自由选用”（《编印凡例》，《开明活叶文选甲种合装册第一》，第1页，开明书店，出版时间不详）。为了方便使用者，编辑方还进行了各种灵活的混编方式，比如，依照中学六年的学生程度，将选文按内容难易和文体性质重新分组，出版甲乙丙丁四种合装册。这些教材的发行范围相当大，故民国时期国文教师自主选文应是一普遍现象。

[10]国文教员沈孜研：《山东省立第三中学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229页，山东省政府教育厅1931年编印。

[11]阎承裕：《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316页。另一位八中教师罗松禅也主张中学生应关注社会现状，而选文中也应有“有关社会问题的文章”，“因为事实上，现在各校的国语教员，成为学生思想有力的指导”，为学生打造“社会意识”，不能只委诸训育主任，国语教员亦有责焉。参看其《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初中第三学年第二学期高中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353页。

[12]刘君复：《山东省立第七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

305—306页。

[13]《新中华国语与国文》并无“单元”的设置。但比如第2册里，宗白华的《学者的态度和精神》、刘蓉的《习惯说》，苏轼的《水调歌头》、俞平伯的《夜月》，周作人的《祖先崇拜》、亚米契斯的《爸爸的看护者》、林纾的《先妣事略》、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都是邻近编排的。内容的相关性很明显。

[14]叶圣陶：《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意见——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上的发言》，《叶圣陶集》第13卷，第225—22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5]李斌《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对此问题也有全面的阐述，参见该书第99—104页。

[16][19]《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166页、第169—170页、第171页，第167页。

[17]《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192页、第198页。

[18][31][42]梁乙真、刘进之、顾绮仲、蔺周坡：《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244—245页，第285—286页，第280—284页。

[20]李广田在中学教师任上对学生影响甚大，《李广田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了当事人的多篇回忆，可参看。

[21]此刊的创刊时间为1933年12月6日，目前可见6期。第1期刊物版权页题名为“六中学生汇刊”；第2期未见；至迟从第3期起，封面上刊名改为“山东省立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版权页则作“菏泽中学学生汇刊”。此从版权页。又，菏泽中学的历史始于1903年创办的曹州官立中学堂和1905年创办的曹州公立普通中学堂。1913年，两校合并，称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次年7月改为省立第六中学。1934年又改为省立菏泽中学，简称荷中。（山东省菏泽地区教育局史志办公室编纂：《菏泽地区教育志（1840—1985）》，第156页，1992年编者自印）师生经常六中、荷中并用，并不严格。

[22]编者：《一年来工作之结算》，《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第4期，1934年6月20日。同样，超过180页的第6期，也依然有“为了篇幅的关系，只好暂时割爱”的稿件。（编者：《半年来工作之检讨》，《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第6期，1935年1月14日）

[23]见创刊号上赵冰者的“题词”。

[24]《编后缀语》，《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第3期，1934年4月27日。再如，第6期的稿件虽然因为“各式各样”影响到了“本刊内容上的统一上”，但胜在可以“代表处于落后的农村里的我们的现实生活”。（编者：《半年来工作之检讨》，《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第6期）

[25]立（逯钦立）：《读罢武者小路实笃底〈凡有艺术品〉》，《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第3期，1934年4月27日。据版权页，逯钦立是本期刊物的总编辑。

[26]王振华：《从“小品文”说起》，《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第5期，1934年11月18日。

[27][29]孙锡禄：《一九三四年中国文坛的鸟瞰》，《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第6期。

[28]谦（逯钦立）：《介绍〈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菏泽中学学生汇刊》第3期，1934年4月27日。文末署：一九三四，总理逝世纪念日。

[30]《山东省立第六大中学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290—291页。

[32]阎承裕：《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316页。再如，也有省立寿张乡村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描述其“日常生活”时说，他们的晨晚自习非常严肃，不允许“阅读那些浪漫颓废的小说”。（杨禄星：《我们的日常生活》，《寿张乡师校刊》第9期，1935年6月）这从反面证明此类小说颇有市场。

[33]罗松禅：《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初中第三学年第二学期高中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353页。按“创造派”一词所指模糊，应是创造社之讹。

[34]国文教员王仲芳：《高密县立初级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493—494页。

[35]《黄县县立初级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559页、第560页。

[36]《平原县立初级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611页。

[37]赵鲁南：《东平县立初级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

649页。

[38]《济南市私立正谊初级中学国文教学概况》,《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民国二十年十月),第704页。

[39]许维修:《关于“阅报”》,《新长中》第2期,1933年12月25日。

[40]光:《译名与笔名》,《市中校刊》二十四年度第1期,1935年10月21日。

[41]《图书馆三年来新书统计》(自民国二十二年八月至民国二十五年七月)、《旧管书籍清册》,《新长中》第9期,1936年12月1日。

[43]当时以《文艺论集》为名的书有多种,调查问卷中经常只写了一个书名,故不易判断到底是哪一种。私立育英中学记录了《文艺论集》的作者——郭沫若。其他学校记录的很可能就是同一本书,因为各个学校间存在一定的信息共享关系。

[44]比如,郭译《屠场》、《石炭王》就出现在了私立育英中学的自备读物目录上。长山县中图书馆也有这两本书。

[45]《新长中》第2期,1933年12月25日。按“勇跃”,原文如此。

[46]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第4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事实上,“中共中央很早就提出要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媒介去动员农民,并专门做出《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第30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需要稍事修正的是,进行底层动员的不仅有小学教师这个群体,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教师同样贡献良多。

[47]刘庆珊:《难忘的记忆》,《济宁地区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122页,1985年编著自印。

[48]辛玮、王新华、张明坦、辛纯:《忆莒县中学一九三四年的一次学潮》,《莒县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莒县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69—70页,1984年编者自印。

[49]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第68页,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50]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1]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第275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具体书目见该书第307—309页“1930年代对师范生有影响的书刊(在山东河北地区师范学校中流传)”表格。又,该书第294—306页统计的“1930年代山东师范学校部分学生(后成为共产党干部)的活动、革命经历及1949年以后所任职务”表格中,参加读书会或传阅革命书刊的情节,出现率也极高。

[52]郑国民:《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第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3]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54]胡适:《致胡近仁》,《胡适全集》第23卷,第368—36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5]桑兵提出:“白话文在历史上真正起作用,主要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辅助工具,以此使得知识人、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发生直接联系,从而造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在其他方面,白话文或语体文并未产生预期的效应,更达不到预定的目标。”见其《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第1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不过他未做具体论证。又,此文初刊《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时尚无这段话。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